

# 赴日元僧东陵永珣书法考略

康 佳 琦

## A Study of Donglingyongyu's Calligraphy

KANG Jiaqi

As the last monk who went to Japan from China in Yuan Dynasty, Donglingyongyu was not on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Buddhist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calligraphy to Japan in Yuan Dynasty.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fe of Donglingyongyu, and finds out the reason why he did not fear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and went to Japan to promote Buddhism. Secondly, it analyzes existing works of Donglingyongyu one by one, and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his calligraphy and the related calligraphy-thoughts. Fi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Yuan Monks in the calligraph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y focusing on Donglingyongyu.

Keywords: Yuan dynasty Buddhist Monks, Donglingyongyu, the Chan sect, spread of calligraphy, *Zhaotingxueshuo*

关键词：元僧，东陵永珣，禅宗，书法传播，召庭学说

### 一 前言

中日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最早始于公元六世纪，并且是通过朝鲜半岛作为媒介而间接进行的。之后经由圣德太子的推崇与弘扬，开始在日本国内开始大力推行佛教，并派遣使者直接“入唐求法”。这一举动不仅打破了先前间接交流的模式，同时也开启了两国佛教间长达千余年的友好交流。这其中，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长期有赖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佛教僧人。他们不仅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使者，同时也是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尤其对书法艺术方面的交流有着不可忽略的贡献。然而，当下学界对于僧人书法的研究尚处于一个瓶颈期，亦或说是将其排除在书法史的主流研究之外。有关僧人书法的研究，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学术界早已展开并且诞生了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与其历史地位不相符合的现象，尤其是在元代中日僧人的书法交流方面。

伴随着“大元”国号的确立，1271年蒙元王朝正式拉开大幕，适时的日本正值幕府统治的镰仓时期。元世祖忽必烈意图以武力征服邻国日本，先后历经“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均以失败而终。两国在历经

过战争的冲突之后，虽然暂时停止了国家层面的交往，但是民间的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却空前繁荣。时至成宗，其秉承世祖“欲聘有道衲子，劝诱以为附庸”<sup>1)</sup>的遗愿派遣元僧一山一宁赴日，此举不仅为元代中日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拉开帷幕，同时也为书法艺术的交流带来了全新局面。据木宫泰彦所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的记载，目前有史可稽的商船往来有四十余次，其中赴日僧十三人，史册留名的入元僧竟多达二百二十余人<sup>2)</sup>。如果说一山一宁是元僧赴日的先行者，那么作为元朝最后一位赴日僧东陵永琦便为这场东渡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鉴于东陵永琦的特殊性，本文以其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以及相关著述进行统计整理，考察其书法风格及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并由此延伸探讨元代僧人在中日两国间书法交流方面的作用。

## 二 东陵永琦与《琦东陵日本录》

### 1 东陵永琦

东陵永琦(1285-1365)，号东陵，四明(今浙江鄞县)人，曹洞宗宏智派僧人，现存可见遗著仅有《琦东陵日本录》，此外《关东诸老遗稿》中也有其相关著述可见。目前有关东陵永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对中日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所作的贡献，且以日本学者的研究较为集中。如高楠顺次郎的《大日本佛教全书》、玉村竹二的《五山文学新集》《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日本禅宗史论集》《五山禅林宗派图》、上村观光的《五山诗僧传》、北村泽吉的《五山文学史稿》、今枝爱真的《中世禅宗史的研究》、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等，对东陵永琦赴日后的交游、文学创作以及相关佛法交流等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相比较之下，中国学者给予东陵永琦的笔墨较为吝啬，仅散见于杨曾文的《中华佛教史》、王颂的《世界佛教通史》、孙东临的《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罗鹭的《五山时代前期的元日文学交流》等，与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东陵永琦作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sup>3)</sup>之一“东陵派”的创始人，为日本佛教界留下了宝贵财富。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曾在其所著《日本禅宗史论集》中说道：“本来传法者，东渡十七师，南询三十一师，其中有法孙继后者有二十四流。”<sup>4)</sup>这些远赴日本的宋元僧侣一方面为日本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东陵永琦作为元代最后一位赴日僧人，其东渡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关东陵永琦的生平事迹，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曾在《五山禅僧传记集成》进行过简单的论述。虽说篇幅仅有一页之短，但却将所参考的文献资料汇编于文后，为我们研究东陵永琦的其人其事提供了强有力支持。现将其列举如下：《琦东陵日本录》、《关东诸老遗稿》、《四明竺仙和尚语录》、《来来禅子东渡集》、《东

1) 《一山国师语录·行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1年，第331页。

2)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20页。

3) “二十四流”即为：千光派(荣西)、道元派(道元)、圣一派(圆尔)、法灯派(觉心)、大觉派(道隆)、兀庵派(普宁)、大休派(正念)、法海派(静照)、无学派(祖元)、一山派(一山一宁)、大应派(南浦绍明)、西涧派(西涧子县)、镜堂派(镜堂觉圆)、佛慧派(灵山道隐)、东明派(东明慧日)、清拙派(清拙正澄)、明极派(明极楚俊)、愚中派(愚中周及)、竺仙派(竺仙梵仙)、别传派(别传明胤)、古先派(古先印元)、大拙派(大拙祖能)、中岩派(中岩圆月)、东陵派(东陵永琦)。

4)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海一泓集》、《无规矩》、《金波海》、《铁庵和纪》、《佛祖宗派图》、《空华集》、《空华日用功夫略集》、《延宝传灯录》、《恩林寺过去帐》、《龙镜寺过去帐》<sup>5)</sup>。关于东陵永琦赴日前的记述相对较少，我们可以从以下简短的论述中探究一二：

“京兆南禅寺东陵永琦禅师，元国四明人。随云外岫得洞上之宗，开法本州天宁。常有志东游，有昆山客谓师曰：‘大仓县，有往日本舶。’师欣然整包。”<sup>6)</sup>（《延宝传灯录》卷第四《南禅东陵永琦禅师》）

“释永琦，元国四明人，东陵其号也。自少参方，随天童云外岫和尚。得洞上之宗，开法本州天宁寺，学徒奔归。常志游扶桑，而无由渡海。至正十一年春，昆山谓曰：‘大仓县，有往日本舶。’师欣然整包。”<sup>7)</sup>（《本朝高僧传》卷第三十《京兆南禅寺沙门永琦传》）

“京兆南禅寺东陵永琦禅师，元国四明人，未详氏族。”<sup>8)</sup>（《日本洞上联灯录》卷第一《元明州天童云外云岫禅师法嗣》）

东陵永琦生逢元朝建立之初的旧宋故土，百废待兴，其“自少参方，随天童云外岫和尚。得洞上之宗，开法本州天宁寺，学徒奔归。”至于东陵永琦为何自幼便参游诸方，宣扬佛法，或许与其家学渊源有关。东陵永琦曾为宋代高僧无学祖元撰写碑铭《大日本国山城州万年山真如禅寺开山佛光无学禅师正脉塔院碑铭》，并在其中说道“禅师予叔祖，俗有瓜葛。”<sup>9)</sup>无学祖元（1226-1286），字子元，号无学，法名祖元，南宋理宗时期生于明州庆元府鄞县。其曾历经元兵入侵南宋，并于温州的能仁寺与元兵对峙。面对生死之际，无学祖元神色自若，朗声吟唱一首偈语：“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亦法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sup>10)</sup>元军闻后悔罪而退。弘安二年（1279），无学祖元在历经南宋覆灭，元朝兴起的混乱局面后，应日本镰仓幕府将军北条时宗的邀请赴日宣传佛法，并成为圆觉寺的开山祖师。无学祖元不仅赢得了以北条时宗为代表的镰仓众多武士的青睐，而且开山立派留名于宋元之际的江南禅林。东陵永琦在撰写碑铭时自称无学祖元为其叔祖，且自谦为“俗有瓜葛”，结合二人均生于鄞县的史实，可见二者间的亲族关系为实。家庭教育的熏陶，氏族环境的培养，这些都是东陵永琦自小便对佛法充满浓厚兴趣的原因。

虽说东陵永琦没有面对国都沦陷、城池残破的场景，但是佛教在元代的生存环境已大不如从前。至正十一年（日本观应二年，1351），东陵永琦受足利直义之请应邀赴日宣扬佛法。适时东陵永琦年岁已高，至于其为何会不畏艰险，远渡赴日，我们可以从其所著《琦东陵日本录》中寻得线索。如其在自述中曾说道：

“永琦，四明人也。闻东国佛法之盛，愿欲一试。而奈大海险阻，远涉难危，遂不果。忽一日有客，自昆山云：大仓有舶航往日东。于是欣然整包，乃附舟焉。辛卯年三月十六日，舟行廿三日，抵

5) 玉村竹二，《五山禅僧传记集成》，思文阁出版，2003年，第516-517页。

6) 高楠順次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8册，潮书房，1931年，第82页。

7) 佛教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名著普及会，1979年，第421页。

8) 高楠順次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10册，潮书房，1932年，第43页。

9) 高楠順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1961年，第331页。

10)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第八卷，第3页。

一岐。”<sup>11)</sup>

或许是出于对蒙元王朝的无奈，亦或许是对日本禅宗的向往，东陵永珣一直便怀有“东游扶桑”的愿景。某日，正值客人来见，相谈中得知有商船往复于中日之间。东陵永珣惊喜之余便赶忙收拾行李，于至正二年（1351）从大仓乘船，不畏海途艰险东游赴日。当然，东陵永珣的赴日并不是个人单方面的强烈意向就可以完成的。末年之际，东陵永珣曾亲笔遗书并致信足利义诠道：“永珣，南国僧也。昨因大三条相公令侃藏主请，至本朝，得蒙相公与老相公作成，十年之间，四住五山。”<sup>12)</sup> 由此可知，东陵永珣的赴日是被邀请的，某些方面还可以说是带有政治色彩的。

东陵永珣的赴日是幸运的，虽然路途艰险且耗费数十日之久，但是安全到达了心中的向往之地。初到京都的东陵永珣暂居于天龙寺，天龙寺住持梦窗疏石为无学祖元的法孙，加之东陵永珣又与无学祖元有亲族关系，因而梦窗疏石对东陵永珣格外照顾，为其在日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伴随着赴日成功的事实，东陵永珣的祈盼终于得到了满足。但是，最初客居他乡的日子是充满艰苦的，由于语言的障碍，东陵永珣曾在《四明野衲东陵永珣奉饯太清记史老师尊友足下》中说道：

“我从元国来远方，且无朋友论哀肠。语言不通众所忌，惟喜太清独称扬。”<sup>13)</sup>

全新的环境，陌生的国度，加之言语不通，使得初到日本的东陵永珣倍感焦虑，只能与知晓汉文的太清宗渭进行交流。而后在足利一氏三代的信任下，加之自己对佛法的刻苦，东陵永珣先后历任天龙寺、南禅寺、建长寺、圆觉寺、妙智寺等。不仅在佛家禅林间宣讲，同时充分发扬自己于汉诗方面的能力。

有关东陵永珣在日的功绩，曾有元师蛮的《本朝高僧传》和高泉性激的《东渡诸祖传》对其进行评价。其中，《本朝高僧传》中元师蛮对东陵永珣的赞语为：

“禅祖之来自支那者，亡虑十有五人，皆是一时英杰也。历迁五岳，宗规传世，珣公殿后来。唱新丰曲，禅海之深，虽不及古，而非今时明僧之类。然观其署述间，有所蔽于诋辞，为珣公惭之，学者详焉。”<sup>14)</sup>

元师蛮一方面肯定了东陵永珣作为禅师在禅宗教化方面的功绩，另一方面认为东陵永珣在日的相关禅语有失偏颇，是东陵禅师的遗憾。而高泉性激对东陵永珣的评价却大为不同，如其在所著《东渡诸祖传》中的赞语说道：

“支那禅门五宗广行于昔，今三宗寥寥弗振，唯临济、曹洞二宗岿然并峙。若此方则自昔以来有此

11) 东陵永珣，《珣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0-81页。

12) 东陵永珣，《珣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3页。

13) 东陵永珣，《珣东陵日本录》，《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0页。

14) 佛教刊行会编，《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2册，名著普及会，1979年，第422页。

二宗而已，且诸祖东渡者，济下居多，而洞下乌有。迨东明日与师戾止，大唱五三之旨，续起永平余韵，厥功顾不伟欤。”<sup>15)</sup>

高泉性激对东明慧日、东陵永珣二僧来日高唱曹洞宗旨的行为进行了大加赞赏。当然，东陵永珣为日本佛教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样也是不可磨灭的。

## 2 《珣东陵日本录》

《珣东陵日本录》为东陵永珣在日所作的语录，现载于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所著《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中，该书所用底本为大正五年（1916）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抄录上村观光所藏本而成的写本。上村观光曾在《五山诗僧传》中提及从故纸堆收集东陵诗偈数十首，欲加以辑录，以《东陵遗稿》为名进行活字印刷一事<sup>16)</sup>。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采用的《珣东陵日本录》本，为一卷一册，封面题签“珣东陵日本录”，原寸为长25.1厘米，宽为18.3厘米。卷末标注“右，珣东陵日本录。京都市下京区今熊野町上村观光氏所藏，大正五年七月写了。”<sup>17)</sup>《珣东陵日本录》共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大元四明东陵和尚住日本国山城州灵龟山天龙资圣禅寺语录、东陵和尚住瑞龙山太平兴国南禅禅寺语录、疏类、序。此外，《关东诸老遗稿》中也收录东陵永珣的部分词句，其所采用底本为积翠文库旧藏本。通过检索这些语录，尚未发现其中有关于书法学习的相关著述，为我们研究东陵永珣的书学观念、书法师承以及书学思想带来困难。

东陵永珣作为元代最后一位赴日僧人，其不仅实现了将佛法弘扬于异国的祈盼，而且还在日本开创了禅宗流派。虽然东陵永珣开创了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东陵派”，但是由于其所属曹洞宗且法系不盛，因而在其逝世后“东陵派”的影响便在禅林中逐渐消逝下去。相比较于同时代赴日僧如：一山一宁、西涧子昙、东明慧日、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在禅宗史上的贡献以及影响，东陵永珣显得较为逊色。然而，禅宗史上局限的并未影响东陵永珣在五山文学中的地位。在日期间的东陵永珣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诗文创作，而且积极参与诗文酬唱、挥毫泼墨、题跋作序等文学活动，加之其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因而结识了许多热衷于文学创作的日本僧，如梦窗疏石、雪村友梅、铁舟德济、独芳清云、义堂周信、石室善玖等。在这些文学僧的支持下，东陵永珣逐步进入了五山文学的中心，义堂周信称“四明东陵师，乃僧史才也”。

## 三 东陵永珣的书法作品

东陵永珣作为元代禅僧，并没有在故国留下较多的痕迹，且其扬名立传是在赴日后的十五年间，不禁使人深思。在日期间的东陵永珣不仅大力提倡曹洞宗风，而且作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东陵派”的创始人被记录了下来，足见其对中日佛法的贡献之大。东陵永珣在日参禅期间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创作，而且经常撰写碑铭、题记、墨迹等，为后世学者对其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然而，

15) 高泉性激，《东渡诸祖传》，内阁文库本，延宝四年。

16) 上村观光，《五山诗僧传》，民友社，1912年，第55页。

17) 玉村竹二，《五山文学新集》别卷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86页。

历代学者在进行书法史研究时，将目光大多集中于历朝历代的有名书家，往往将僧人书法置于一个较为“轻视”的地位。究其缘由，一是僧人书法大多游离于“正统”书法的历史轨迹，二是僧人书法作品的类型化、独特化、佛教化，使得研究较难顺利进行。有关东陵永巧的书法研究现状便是僧人书法研究的一个缩影。

日本学者中较早关注东陵永巧书法的是熊谷宣夫，其最早于1933年便在《美术研究》发表论文《佛鉴禅师像：东陵永巧赞》，该文重点对神奈川圆觉寺所藏无准半身顶相进行分析，着重于通过美术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进而忽略了东陵永巧所题赞书法的艺术价值。而后田山南方于1955年在其所著《禅林墨迹》中收录东陵永巧墨迹《召庭字号》（梅泽彦太郎藏）、《召庭字说》（重要文化财、京都天龙寺所藏），小松茂美在1979年所著《日本书迹大鉴》中收录东陵永巧墨迹《诗卷后序》，东陵永巧的墨迹开始被人熟知。中国学者对于东陵永巧书法的关注较为滞后，主要有韩天雍的《中日禅宗墨迹研究》、胡建明的《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戎龙超的《元代佛教书法研究》以及江静的《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等。综上所述，有关东陵永巧书法的研究大多流于表面，或依附于其他艺术作品，或一笔带过。不仅没有对其书法作品进行细致分析，且忽视了东陵永巧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本文现就东陵永巧所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进行逐一分析。

## 1 《诗卷后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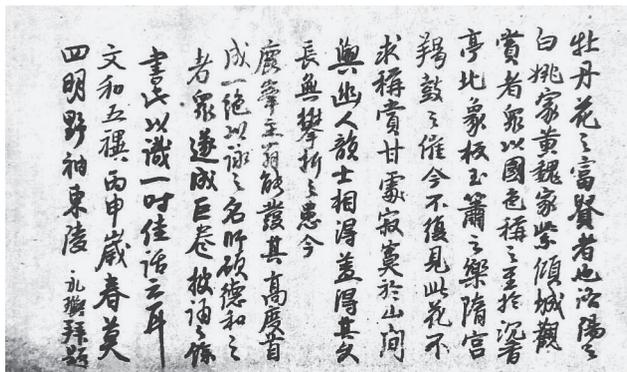


图1 18)

释文：牡丹，花之富賢者也。洛陽之白、姚家黃、魏家紫，傾城觀賞者，眾以國色稱之。至於沉香亭北、象板、玉簫之樂、隋宮羯鼓之催，今不復見。此花不求稱贊，甘處寂寞。於山間與幽人韻士相得，蓋得其久長，無攀折之患。今鹿峰主翁，能發其高度，首成一絕以詠之。名師碩德，和之者眾，遂成巨卷。披誦之余，書此以識一時佳話云耳。文和五祀丙申歲春暮，四明野衲東陵永巧拜題。

《诗卷后序》（图1）为东陵永巧七十二岁时所作，现藏于五岛美术馆。由该卷落款可知此卷成书时间为丙申年初春之际，适时正值日本延文元年（1356），此时的东陵永巧于镰仓建长寺任住持。暮春之时，东陵永巧前往圆觉寺看望故友乾峰士县，巧遇乾峰士县与其众友正以“牡丹”为题进行作诗，并参与其中。

18) 小松茂美，《日本书迹大鉴》第六卷，讲谈社，1979年，第91页。

待众人作诗完成并汇集成卷后，东陵永珣题跋于诗卷之后并留下此墨迹。跋语中首引北宋周惇颐《爱莲说》之“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足见其对宋学研究之深。

《诗卷后序》全卷通篇十四行，楷行二体兼施，虽字字独立却又连贯成行，行与行之间保持均匀的留白，互不打扰。观其笔势，古朴娟秀，苍劲矫健，行笔间以简单的行进代替复杂的波曲，于质朴之中却又不失其摹古之势。全篇线条摒弃了大开大合之态，采用等粗的线条进行书写，使得该卷古意盎然，朴素大方，极具书法的朴拙之美。相比较于今人过分跳动线条的选择，东陵永珣选择如此安静的线条进行书写，足见其深谙古法之神，并且也与今人行草作品的过分夸张之态形成强烈对比。整卷的章法于朴茂中见疏朗，得恣肆之态，浓淡相宜的墨色表现不仅丰富了作品色彩的变化，同时也使得该卷更具起伏之态。小松茂美在其所著《日本书迹大鉴》一书中对此书作大加赞赏，认为其笔意悠扬致、有苍劲之感。

## 2 《召庭字号》



图 2<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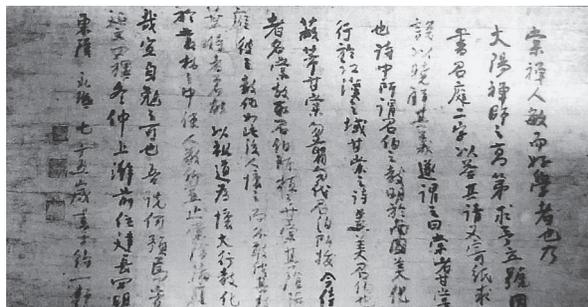
释文：召庭。

《召庭字号》（图 2）为东陵永珣七十五岁时所作，也就是其来日后的第八年，东京梅泽彦太郎所藏。此卷为大字书作，右侧写东陵老叟四字，左侧写崇禅人书四字，由此可知该卷是东陵永珣为崇禅人所作。至于东陵永珣为何以“召庭”二字进行书作，还要源于崇禅人慕名向东陵永珣索求道号一事。崇禅人为南禅寺第二十二任住持大阳义冲之法嗣，其之所以向东陵永珣索求书作，究其缘由，大抵是对东陵永珣佛学修养与文学涵养两方面的双重肯定。面对崇禅人的索作，东陵永珣并未吝嗇，随即楷法榜书“召庭”二字赠予。

《召庭字号》为大字墨迹，其命名源于中间“召庭”二字，该作不仅是东陵永珣唯一的楷书墨迹，同时也是唯一的榜书之作。召庭二字笔画遒劲，结字工整，体势典正，厚重稳妥，颇有颜鲁公榜书之风范。尤其是召字上半部分的刀，其钩状与笔画本身呈现巨大的粗细对比，是颜真卿书法的特点之一。该钩以“驻提”的形式出现，先“驻”再“提”，以“驻”借力，顺势而出。庭字的最后一笔捺画，虽然起笔藏于笔画之中，但是一波三折之态仍清晰可见。笔画末尾所作波挑，似无意为之，却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全卷的粗细对比。纵观召庭二字，俨然是颜真卿的影子，并带有些许南宋书坛大家张即之的风范。虽说东陵永珣并未留下其书学师承的相关记载，但是仍可从其书迹中寻得部分师法。

19) 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下卷，思文阁出版社，1981年。

## 3 《召庭字说》

图3<sup>20)</sup>

释文：棠禅人敏而好学者也，乃大阳禅师之高弟。求予立号，因书召庭二字，以答其请，又寄纸求说，以晓解其义。遂谓之曰：“棠者甘棠也。诗中所谓召伯之教明于南国，美化行于江汉之域，甘棠之诗盖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拔。今侍者名棠，故取召伯所植之甘棠，其阴满庭。彼之教化如此，后人怀之，而不敢伐其枝叶。侍者若能以祖道为怀，大行教化于丛林之中，使人敬仰，岂止棠阴满庭哉。宜自勉之可也，吾说何预焉。”时延文四祀冬仲上澣，前往建长四明东陵永琦。七十五岁，书于待一轩。

《召庭字说》(图3)与《召庭字号》为同一年所作，也是东陵永琦七十五岁时所作，现藏于京都天龙寺，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此卷可视为《召庭字号》的姊妹篇，亦可看作是对《召庭字号》的解释。作为大阳禅师的得意弟子，棠禅人“敏而好学”。但是在面对东陵永琦给其题写的道号“召庭”后，却不知其中所意，随即再次进行请教。东陵永琦面对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自然乐于解惑，并为其进行了详细解答。从解答中可以得知，东陵永琦引经据典，借《诗经》中《甘棠》一诗来解释“召庭”之由来。不仅表现出他精于参禅顿悟，同时对于诗歌的学习可谓尚古博今。东陵永琦曾在为清拙正澄撰写的《清拙大鉴禅师塔铭》中说道：“余生于元朝之初，及见宋末三教诸大老。”<sup>21)</sup>虽然东陵永琦的生活范围为有元一代，但其整体的文学艺术的宗旨还是向往宋学，这也和江南大部人士的向往是一样的。

《召庭字说》全卷通篇十四行，与《诗卷后序》行数相同，不知东陵永琦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作。该卷为行草墨迹，依旧保持了字字独立的书写习惯，却又不耽误其笔意连带而露出的顺畅之意。单字来看，其线条相较于之前的书作显得更加紧实，并且带有些许的篆籀气。笔法愈加娴熟，字体更为紧实，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更加疏朗，但通篇来看却毫无分离、疏散之意。线条在行进中凸显流畅而又不滑于表面，颇显古意。在行草书多弧曲线条的条件下，依然能有这样的保留，实属不易。纵观全篇，粗细变化开始变得极为明显并呈现跳动之态，这一切源于东陵永琦在行笔时对于“突然提按”的频繁使用。这种突发式的变化，在增强行草书性情的同时，使得线条更加跌宕起伏并且充满强烈的矛盾对比，但这些变化存于书卷之上却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召庭字说》的整体风貌亦可参见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二者的体态风貌有着许多

20) 田山方南，《禅林墨迹》下卷，思文阁出版社，1981年。

21) 东陵永琦，《清拙大鉴禅师塔铭》，《续群书类从》，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1年，第420页。

相同之处。暮年之际的东陵永巧，其对于书法的理解早已谙熟于心，不再是简单的模仿与习作的阶段，已将所学浑然一体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 4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



图 4 22)

释文：得破菴之道。起正继之传。子孙满天下，流芳东海边。佛光接佛国。斯道如俨然。高滩安上月轮圆。佛鉴无准禅师像，高安少室芳长老请。建长比丘东陵永巧赞。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图 4）现藏于镰仓市圆觉寺，为神奈川县文化财。关于其作书时间，由于画上并未题有任何纪年，且相关文献并未著录此作，故无从考证。熊谷宣夫于《佛鉴禅师像：东陵永巧赞》<sup>23)</sup>一文中推测其大约为东陵永巧示寂之前不久所作。该作为东陵永巧为无准师范画像的题赞，文中充分表达了东陵永巧对于无准师范禅师的高度赞赏，并且文字之间洋溢着仰慕之意。

《题赞无准半身顶相》全卷共九行，仅六十一字却高度赞扬了无准师范。这篇墨迹用行书体，错落有致，行笔之间带有明显的宋代尚意书风，流畅之际却又不显轻浮。题画字迹混圆有致，写得洒脱自在，足见东陵永巧对于笔法之深谙。笔力浑然而于纸上却显得凝练而活泼，题跋与画作之精妙可谓相映相成，颇有宋人笔墨的雅趣。想必东陵永巧在为无准师范进行题赞时也是充满敬意的。

此外，目前可见署名为东陵永巧的墨迹还有两幅，分别为《焚香拜赞》和一副水墨画卷的题跋。其中，《焚香拜赞》（图 5）仅见于徐利明于 1990 年所著《中日高僧书法集》一书，该书并未标注其藏所，且相关著录中并未提及此墨迹，真伪难辨，在此不作叙述。另一幅为日本关西 2018 年春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曾拍卖一副带有署名为东陵永巧题跋的水墨画卷（如图 6），该作画面右上侧题跋为：“放袋携书入市中，暮云一片隔天宫。解言日本现弥勒，千亿分身定此翁。南禅永屿东陵拜赞。”但是观其笔意，并与上述东陵永巧

22) 胡建民，《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6年，第170页。

23) 熊谷宣夫，《图版解说·佛鉴禅师像》，《美术研究》第十七号，1993年，第36-37页。

的书作进行比较发现，该作的书学传承与之相距甚远，似不为东陵永珣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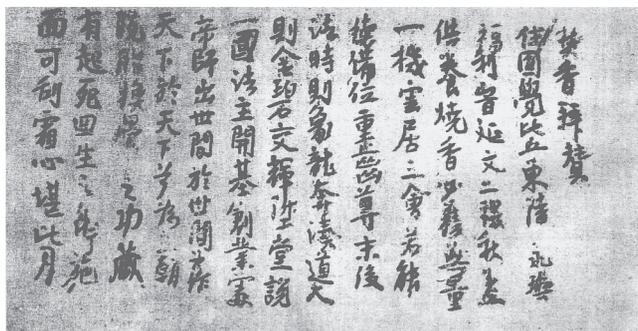


图 5<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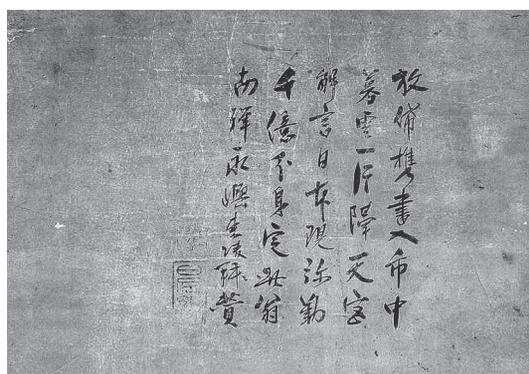


图 6

综上所述，东陵永珣并未留下相关论书语录，且有序留存下来的墨迹较少，为我们全面分析其书法风格特征带来许多困难。但是观察其现存墨迹的笔法与风格，依旧可以其书迹中寻得强烈的元代风貌与宋代风尚，这种近乎矛盾的双重书法风格的重叠，与东陵永珣的生存环境紧密相联。东陵永珣出生于元代初年，此刻不仅北方书坛沿袭旧金的崇颜风尚，而且江南地区的小学教育推行颜书。《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礼之《庙学典礼》中曾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绍兴路小学中教学活动的规定：

“至元辛卯（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廉访分司命复设养蒙斋于东庑，俾儒士及凡民之俊秀，八岁以上上小学。给早晚膳，选才堪模范者二入教之，月廩各米一石。来学者具束修，贫不能致者，勿强。日讲授朱文公集注《四书》、《小学》书等，成诵覆说，课以口义、诗对，书用颜字为准，正、录以时程试而察其勤惰。”<sup>25)</sup>

通过记录我们得知，元初江南小学中沿袭北方有关规定，诵读的课本皆是程朱理学下有关书籍，并且习字一项

24) 徐利明，《中日高僧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25)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是以“颜字为准”。东陵永珣的生活范围正好与颜真卿书法的推行范围相吻合，因此不难理解其墨迹中带有强烈的颜鲁公痕迹。有关宋代风尚的痕迹，同样与东陵永珣的生活范围息息相关。东陵永珣的生活之地本身就是旧宋故土，因此家族中对于宋代书法的并不是陌生的，他们在日常的书写中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幼年的东陵永珣。

整体来看，东陵永珣的生活年代跨越整个元代，其赴日时为日本北朝观应二年（1351），时年六十七岁。在日十五年的时间并不会改变东陵永珣的书写痕迹，因此可以说他的书法是在赴日之前便已成型。元代书法的发展呈现出一明一暗两条主流，明为赵孟頫的复古之风，暗为颜真卿的盛唐风尚。二者虽表现出不同的外形特征，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以追崇魏晋风尚为旨归。在经历过颜真卿、赵孟頫的洗礼之后，元代后期书坛开始出现一种新生力量，即隐士书家群体。该群体在面对人生时采取潇洒自在、悠闲处世的态度，不再为世俗名利所动，转而追寻个性与独特的创新之路，将内心的反叛、淡泊、而又强烈的个人意志通过书法作品表达出来。东陵永珣面对创新时风的影响，并不会全然拒绝，也不会全盘吸收。但是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都可看到一些时风的影子。如《召庭学说》、《诗卷后序》等，已不再拘泥于原有的固定模式，开始追寻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个人风貌。

#### 四 结语

元代僧人在中日文学、艺术方面的交流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大量往来于中日之间，才使得在短短百余年的时间内，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片繁荣局面。正如木宫泰彦所说：“五山文学，比起平安朝时代贵族玩弄的汉文学以及江户时代的儒者所作的汉文学来，远为优秀，完全摆脱了日本腔调，几乎和纯粹的宋元诗文学无异。五山文学所以能这样完全摆脱日本腔调，达到可以和宋元诗人作品媲美的地步。”<sup>26)</sup> 东陵永珣作为元代赴日的众多禅僧中的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不仅实现了自我的抱负，同时也为中日两国间的佛法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异国他乡的艰难环境并没有阻碍其自身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不仅开创了属于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的“东陵派”，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文与墨迹，使得其在禅宗史、五山文学史以及书法史上皆占有一席之地。

东陵永珣的书法整体上表现两种风貌，即宋代“尚意”书风和元代“崇颜”书风二者的有机结合。究其缘由，主要与东陵永珣的家学传承和生活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是其整个家族与家学均来源于对旧宋的文化遗产，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其在自幼的生活与学习中便对宋代“尚意”书风进行了有序的传承。二是其生活年代已为元朝统治，且跨越其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因而元代书坛的“崇颜”风尚势必会对其书法学习产生影响。此外，东陵永珣赴日前已六十七岁高龄，其书法风格早已成熟，因而其所创作于日本的墨迹更多的是对其书法学习的一个展示。较为遗憾的是，东陵永珣并未对书法给予较多的精力，因而并未留下有关书学的著述，加之其留存于世的墨迹较少，使得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较为尴尬，且不为研究者重视。类似东陵永珣的赴日元僧人还有许多，虽说他们在中国以及赴日后均留下了大量优秀的书法创作，但是他们大都将一生的精力倾注于佛法且开宗立派，使得其书名被掩盖于历史之中。通过对东陵永珣书法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元代书坛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僧人书法在元代书法史中的地位，进而可以由此延伸探讨元代僧人书法在中日两国间书法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26)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92页。

